

# 「鄉先生」——一個被忽略的宋代私學教育角色\*

鄒重華

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

宋代崇尚學術文化，科舉規模擴大，政治環境較為寬鬆，政府與士大夫大力興學，加上社會經濟發展，印刷業昌盛，書籍容易獲得，凡此種種因素，導致宋代官、私教育的空前普及和發達。書院是宋代私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，歷來為學者所重視，有關研究亦頗多，其他有關中國書院史之諸多專著，亦以宋代為討論之重點。然而，宋代私學教育的另一個重要部分——鄉先生的私學教育，卻未引起學者之足夠重視。雖然一些學者的論著中曾提到鄉先生(或民間私學教師)，<sup>1</sup> 卻未從整體上意識到這一角色在宋代私學教育中的重要性(或語焉不詳)，迄今未見有專門研究論著發表。筆者擬以宋代四川地區為例，對「鄉先生」這一角色作初步的探討，期拋磚引玉，以就教於方家。

何謂「鄉先生」？《辭源》釋曰：「年老辭官居鄉的人。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『奠摯見於君，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。』注：『鄉先生，鄉中老人，為卿大夫致仕者。』又《鄉飲酒禮》：『主人

\* 拙文承蒙許師倬雲教授、陳師學霖教授、其他師友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審閱並提出寶貴意見，特此致謝！

<sup>1</sup> 如下列有關宋代私學的討論：吳寬：《中國古代私學發展諸問題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186-88；陳世松、賈大泉（主編）：《四川通史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第四冊，頁268-70；苗春德（主編）：《宋代教育》（開封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頁79-86；劉復生：《北宋中期儒學復興運動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1年），頁156；毛禮銳、沈灌群（主編）：《中國教育通史》（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第三卷，頁38-42；楊榮春：《中國封建社會教育史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222-29。

就先生而謀賓介。」注：「先生，鄉中致仕者。……古者年七十而致仕，老於鄉里，大夫名曰父師，士名曰少師，而教學焉。」<sup>2</sup>

《辭海》釋曰：

古時尊稱辭官居鄉或在鄉任教的老人。《儀禮·士冠禮》：「遂以摯見於鄉大夫、鄉先生。」鄭玄注：「鄉先生，鄉中老人為卿大夫致仕者。」又《鄉射禮》：「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。」賈公彥疏：「先生，謂老人教學者。」<sup>3</sup>

臺灣版《辭海》同樣引上海版《辭海》之史料後云：「按兩訓義實相成，致仕之鄉先生教於鄉，故疏云然。」<sup>4</sup> 以上解釋之「鄉先生」，乃上古之意，然而，上述三部工具書均未言及「鄉先生」詞義自上古以後之演變。該詞意義在隋唐以前之演變，尚待稽考，但至少到宋代，「鄉先生」一詞之涵義已有了較大變化。

北宋四川知名學者、成都郫縣人楊天惠在《樂善郭先生[絳]誄》中解釋說：

孟子論士，以為入而獨善其身，則仁義忠信樂善不倦；出而私淑諸人，則孝弟忠信誨人不倦。如此人者，蓋古之所謂天之君子，而今之所謂「鄉先生」者也。<sup>5</sup>

簡單地說，宋代所謂「鄉先生」者，常常是指民間私學教師，以教人子弟為業。亦即後世所謂私塾教師。一般而言，「鄉先生」以教授儒家經典為主，同時也兼有楊天惠借孟子之言而提出的道德說教者的角色，以傳播儒家倫理為己任。楊天惠認為郭絳（字長儒，成都人）就是這樣的「鄉先生」。故「鄉先生」一詞在宋代已非年老致仕而居鄉者之專有尊稱，亦非專指老人教學者。

查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製作之「二十五史中文全文檢索系統」中「鄉先生」一詞，共錄得十一條，計《宋史》四條，《元史》五條，《明史》及《清史稿》各一條。首見於脫脫等《宋史》卷三百十七《邵亢傳》的記載云：「〔邵亢〕方十歲，日誦書五千言，賦詩豪縱，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。」此處意義不明，既可能指鄉之有德望者，亦可能指私學教師。同書卷四百十八《文天祥傳》謂：「〔天祥〕自為童子時，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、楊邦乂、胡銓像，皆諡『忠』，即欣然慕之。」這顯然指的是鄉賢。而同書卷三百三十七《范鎮傳》記范鎮「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」，卷四百五十一

<sup>2</sup> 《辭源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1年修訂版），第四分冊，頁3117。

<sup>3</sup> 《辭海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89年），上冊，頁250。

<sup>4</sup> 《辭海》（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80年最新增訂本），下冊，頁4399。

<sup>5</sup> 載傅增湘（篆輯）：《宋代蜀文輯存》（香港：龍門書店影印，1971年），卷二十六，頁二十二下（總頁370）。李弘祺認為：「把孔子的私人教育加以實踐並推廣的當然是孟子。」見李弘祺：《絳帳遺風——私人講學的傳統》，載劉岱（總主編）、林慶彰（本冊主編）：《中國文化新論·學術篇：浩瀚的學海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3年修訂再版），頁343-410；引文見頁357。

〈趙良淳傳〉云「良淳少學於其鄉先生饒魯」，就指的是私學教師了。<sup>6</sup>《元史》所載五條，有兩條意義不明確，另三條則明指私學教師。<sup>7</sup>《明史》的一條見於〈禮志〉中，故仍為上古之義。《清史稿》的一條亦明指私學教師。<sup>8</sup>

《宋史》中的「鄉先生」一詞雖然不多，但宋人文集中卻屢不絕書，且許多是指私學教師。如南宋紹興時眉州(治今四川眉山)人史堯弼《蓮峰集》卷十〈楊君夫人彭氏墓誌銘〉云：

夫人平生喜尊禮師儒，出於天性。始〔張〕耆之父岷少從其伯父張公正己學文，教授為鄉先生，夫人使〔其子楊〕松從受業，積十餘年，敬愛日加於初。<sup>9</sup>

在這條史料中，史堯弼很明確地用「鄉先生」來指稱民間私學教師。

我們再看看四川以外其他地區的情況。北宋山東東平(今山東東平)人劉跂(宰相劉摯子)《學易集》卷六〈東原集序〉云：「昔我先人，蚤以諸生從鄉先生龔公學。」南宋楊萬里《誠齋集》卷八十一〈羅氏一經堂集序〉云：「廬陵〔今江西吉安〕有鄉先生曰羅天文，以詩學最高，學者爭從之。……於束修之問雖不卻，亦不責，往往貧者從之多於富者之從之也。」又其卷一百十九〈奉議郎臨川知縣劉君行狀〉云：「君諱德禮，……父遇為鄉先生，授徒數十百人。」劉氏為吉州安福縣(今江西安福)人，楊萬里為江西吉水(今吉水)人，與廬陵、安福相鄰，故所記均為其家鄉的情況。南宋劉克莊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一百五十四〈大理卿丘公墓誌銘〉云：泉州安溪(今福建安溪)人丘氏兄弟少時「受春秋學于鄉先生余公克濟」。又卷一百五十七〈韓隱君墓誌銘〉云：「君諱永，字昭父，幼刻苦，受業于鄉先生弘齋鄭公某。」韓永為懷安(今福州市)人。又卷一

<sup>6</sup> 脫脫等：《宋史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)，頁10335，12533，10790，13265。

<sup>7</sup> 意義不明確的兩條見宋濂等《元史》卷一百六十一〈王鶚傳〉：「鶚始生，有大鳥止於庭，鄉先生張瀛曰：『鶚也。是兒其有大名乎！』」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，頁3756)卷一百七十八〈劉敏中傳〉：「劉敏中……幼卓異不凡，年十三，語其父景石曰：『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，豐於功而不自衒，此後人所弗逮也。』」父奇之。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，極稱之。」(頁4136)明指私學教師的三條見卷一百八十二〈歐陽玄傳〉：「歐陽玄……八歲能成誦，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，日記數千言，即知屬文。」(頁4196)卷一百八十九〈同恕傳〉：「恕安靜端凝，非如成人，從鄉先生學，日記數千言。年十三，以書經魁鄉校。」(頁4327)卷一百九十〈陳旅傳〉：「陳旅……惟篤志於學，於書無所不讀。稍長，負笈至溫陵，從鄉先生傅古直游，聲名日著。」(頁4347)

<sup>8</sup> 張廷玉等：《明史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4年)，卷五十四，頁1386；趙爾巽等《清史稿》卷四百八十〈施璜〉：「施璜……少應試，見鄉先生講學紫陽，瞿然曰：『學者當如是矣！』遂棄舉業，發憤躬行。」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年，頁13116)其後施璜即以教人子弟為業。

<sup>9</sup> 《蓮峰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(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-1986年)，第一一六五冊，頁十三上至十三下(總頁776)。

百六十三〈黃德遠墓誌銘〉云：「余里中有二黃君，績字德玉，績字德遠。……德玉高科，早卒。德遠少與兄齊名，既弱一箇，名愈重，遂為鄉先生，三十年門人著錄牒以數十百計。」又卷一百六十五〈陳光仲常卿墓誌銘〉云：「陳、劉二氏，父祖世聯牆，子弟幼同學。余為童子時，與君及二兄俱受學於鄉先生方澤儒。」<sup>10</sup> 劉克莊為福建莆田（今莆田）人，其所記均為福建的情況。此類史料尚多，不勝枚舉。

以上所引史料很清楚地表明，無論北宋或南宋，亦無論四川或北方的山東、南方的江西、福建，人們均以「鄉先生」一詞習稱民間私學教師，毋庸置疑。當然，以「鄉先生」指鄉賢的也不少，有時兩者意思都有，這是需要細心加以甄別的。筆者所用資料，或為明指私學教師，或為兩者意思都有者，凡意義不明確者，一律不採用，以免誤解。<sup>11</sup> 鑑於自宋以後之正史中始有「鄉先生」一詞，且又於宋人文集中發現宋人以此稱呼私學教師之大量事例，這是否意味著，私學教師的大量出現，是宋代才有的事。筆者尚無力探究五代以前之史實，僅此提出問題，以待來者。

## 二

南宋名相虞允文（隆州仁壽人，今四川仁壽）後代虞集入元以後，談起故鄉的教育云：

百十年前，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，自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禮》，皆依古注疏句讀，授之正經，日三百字為率；若傳注、史書、文章之屬，必盡其日力乃止，率晨興至夜分，不得休，以為常。持身以尚孝友、惇忠信、厲節義為事。其為文多尚左氏、蘇子瞻之說。及稍長，而後專得從於周、程之學焉。故其學者雖不皆至博洽，而亦無甚空疏。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，則古聖賢之書、帝王之制度，固已先著於胸中。及得其要，則觸類無所不通矣。<sup>12</sup>

虞集這段話表明：第一，鄉先生的教育從兒童啟蒙開始，教學內容嚴謹，對學生要求十分嚴格，在傳授知識的同時，亦灌輸儒家倫理。這些都與前述楊天惠對鄉先生的解釋相吻合。第二，周、程之學在四川廣泛流行，是南宋以後的事，<sup>13</sup> 故虞集所講，是南宋

<sup>10</sup> 《學易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一二一冊，頁四下（總頁583）；《誠齋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日本鈔宋本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7年二版），頁675，1054；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賜硯堂鈔本，頁1363，1393，1452，1465。

<sup>11</sup> 本文中所提到的私學教師，有的在史料中未以「鄉先生」稱之，特予說明。

<sup>12</sup> 虞集：《道園學古錄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明刊本，卷五〈送趙茂元序〉，頁69-70。

<sup>13</sup> 參見胡昭曦、劉復生、粟品孝：《宋代蜀學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7年）。

時的情況；而鄉先生之教學，則應是自北宋以來的一貫風格，故為文仍尚蘇軾之說。第三，鄉先生的教育為士子以後的學習和鑽研學問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

眉州彭山(今四川彭山)馮損之(985-1075)舉進士不第，退而講學誨人：

每正席橫經，演明大旨。凡訓傳之殊聘及其膚說，則判別是否歸于至當。學者多信嚮之，往往化而博彊。先生常曰：「學所以治性修身而充吾之所有，非特誇論辯要利祿為也。能積乎中發而粹乎外，則無媿為君子。」<sup>14</sup>

馮損之享年九十一歲，所教學生當不少。

普州安岳(今四川安岳)楊恕(1037-1077)為童兒時，日誦千言，稍長，酷愛《左氏春秋》，能從頭到尾背誦，不差一字。鄉先生王田「砥礪名節，以教鄉閭之子弟，來學者必考其素。至君來，欣然受之曰：『此諸生之表也。』」<sup>15</sup>可見王田對求學者的要求是很高的。

長寧軍劉仲達(1192-1235)「教授鄉之子弟，先灑掃進退之事，治經必精求義理」。<sup>16</sup>長寧軍(治今四川長寧縣南雙河鎮)在川南，為文化較落後的偏遠地區，但鄉先生之教學風格，與西川無異。劉仲達生當理學流行之時，故治經強調精求義理。

馮損之、楊恕、劉仲達分別生活於北宋前期、北宋中期和南宋中期，其地域包括了四川西部、中部和南部。馮損之所處的眉州與虞集故鄉隆州相鄰，劉仲達與虞集所述的時代相當。綜上所述，縱貫兩宋的四川各地，鄉先生教育的風格是基本一致的，惟南宋時教學內容隨學術風氣而轉變，偏重於理學。

宋代四川許多著名學者，曾接受過鄉先生的教育。

蘇軾、蘇轍兄弟曾師事眉山人史清卿，慶歷、嘉祐間，又從劉巨學。同時從劉巨學習的還有眉山家氏之家勤國及其從兄家安國、家定國。劉巨當為頗負時望的鄉先生。家安國、家定國(1031-1094)兩兄弟均登進士第，家安國曾任教授，著有《春秋通義》二十四卷等。家定國受歐陽修友人、眉州通判張谷賞識，攜至京師，登進士第。家定國工於詩律，為蘇轍所稱賞，有詩集三十卷、雜文十卷。王安石久廢《春秋》學，家勤國憤

<sup>14</sup> 呂陶：《淨德集》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本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9年)，卷二十六〈長樂馮先生(字損之)墓誌銘〉，頁四下。

<sup>15</sup> 黃庭堅：《豫章黃先生文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宋刊本，卷二十三〈楊寬之(恕)墓誌銘〉，頁259-60。「王田」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《山谷集》作「王由」。

<sup>16</sup> 楊棟：〈劉仲達墓誌銘〉，載《宋代蜀文輯存》，卷九十三，頁十五下(總頁1179)。

之，著《春秋新義》。熙寧、元豐諸人紛更，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，勤國憂之，為築室，作〈室喻〉，二蘇讀之敬嘆。<sup>17</sup>

文史俱佳的北宋名臣、成都華陽范鎮(1008-1088)，「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」。成都雙流鄉先生鄧琛以經學授徒，「群聚至數百人，翕然知學」。其子鄧至，學問益大，號「二江先生」。鄧至「通六經，學者從之甚眾。每出入市邑，人皆拱立」。鄧氏父子二人皆以私學教師為業，鄧至子孫科宦顯達，鄧至亦以善教子而聞名。范鎮與鄧至為友，范鎮從子范百祿亦從之游。<sup>18</sup>

成都蒲遠猷(1011-1092)「少而能賦，與女弟幼芝俱有聲於劍南」，與黃庭堅為友。蒲遠猷曾學賦於代淵，受易於任維翰，學詩於周式，受太玄於徐庸，黃庭堅稱其「皆從蜀之大儒」。<sup>19</sup>代淵為著名鄉先生(詳見本文第四部分)，任維翰生平不詳，只知其為私學教師。「鄉先生任維翰若釋中古，皆通經，善講解，悉從之游」。成都雙流章督(993-1068)未冠治經術，往來成都，求師質問大義，亦從任維翰學，「得其要旨妙論」。<sup>20</sup>章督博通經學，尤長於《易》，揚雄《太玄經》。<sup>21</sup>

眉山趙蒙之父馬服先生以文章道義游兩蜀，聲名卓著，士人欲宗師之。北宋中期著名蜀籍學者文同曾從其學《易》。趙蒙之父雖為鄉先生，但在他出生數月後便被聘去他

<sup>17</sup> 王梓材、馮雲濠(輯)：《宋元學案補遺》(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2年)，卷九十九〈蘇氏蜀學略補遺·史先生清卿〉，頁十八上；《宋史》卷三百九十〈家恩傳〉，頁11949；《淨德集》卷二十三〈朝請郎新知嘉州家府君(定國)墓誌銘〉，頁四上至七下。

<sup>18</sup> 蘇軾(撰)、孔凡禮(點校)：《蘇軾文集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)，卷十四〈范景仁[鎮]墓誌銘〉，頁441-42；南宋人(撰)、費著(修訂)、謝元魯(點校)：《氏族譜·鄧氏》，載《巴蜀叢書》第一輯(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8年)，頁286；楊芳燦等：嘉慶《四川通志》(臺北：華文書局，1967年)，卷一百四十四〈人物志二·鄧至傳〉，頁二十一上(總頁4381)。

<sup>19</sup> 蒲遠猷：〈自撰墓誌〉，載《宋代蜀文輯存》，卷十七，頁九下至十下(總頁256)；《璋黃先生文集》卷二十四〈蒲仲輿[遠猷]墓碣〉，頁275。

<sup>20</sup> 《淨德集》卷二十八〈沖退處士章督行狀〉，頁三上至三下。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一百四十四〈人物志二·何維翰傳〉記：「何維翰，字叔良，成都人。南省不第，遂不復應舉，居鄉里，以教導為事。薛簡肅奎薦其文行，賜粟帛。韓魏公琦安撫劍南，時蜀大旱，維翰募民間，得米千斛以助賑濟。琦嘉之，薦授四門助教，辟府學說書。」(頁十五下[總頁4378])薛奎於仁宗天聖四年至六年(1026-1028)知益州，其時任維翰的學生蒲遠猷為十六至十八歲。何維翰很可能就是任維翰，「何」乃「任」之筆誤。周式為湘陰人，曾官國子助教、嶽麓書院山長，講道著書，為詩書名儒，是成都名士張崇文(字春卿)之婿(參見文同：《丹淵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明刊本，卷四十〈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〉，頁299；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六〈士劉諸儒學案補遺·國簿周先生式〉，頁三十二上至三十二下)。徐庸為三衢人，仁宗時官至直集賢院，著有《周易意蘊》，其論《易》祖劉長民(牧)，兼本陸乘(黃宗羲[原著]、全祖望[補修]、陳金生、梁運華[點校]：《宋元學案》[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6年]，卷二〈泰山學案·集賢徐先生庸〉，頁123)。周、徐二人均非蜀人，當寓居於蜀。

<sup>21</sup> 《宋史》卷四百五十八〈章督傳〉，頁13446。

郡作私人教師，十四年不歸。趙蒙母親從小教其學書念文字，「既冠，遣從師爲詞章」，亦從鄉先生學習。後趙蒙登仁宗嘉祐進士第。<sup>22</sup>

資州(治今四川資中)李石(1108-?)爲著名經學家，年九歲，從學於鄉先生張子覺。李石在其所撰〈支興道(時起)墓誌銘〉中云：

張子寬(覺)先生，易師也。以小學教授，雖童稚勝衣者登其門，皆以著數授之。凡前輩讀《易》有聲場屋者，自其門出。石年九歲，與支君興道、吳君德駿同遊先生之門，先生遇之，不以童稚句讀也。<sup>23</sup>

李石〈自敘〉又云其「探象數於鈞道先生」。<sup>24</sup>鈞道先生即張子覺。李石弟李占幼學於其兄，甫冠，從學於鄉先生何三捷。<sup>25</sup>李石、李占兄弟之學術，既得之於家學，又得之於鄉先生。

眉州楊天倪(字致一)、劉真(字子野)、史漸(字鴻漸)皆以經術教授鄉里，眉州青神(今四川青神)楊泰之(1169-1230)幼從黃裳學(參見本文第四部分)，後又歷登楊、劉、史之門，皆列高第。<sup>26</sup>楊、劉二氏生平不詳，史漸曾作過成都府學教授，《宋代蜀文輯存》收有其文三篇。<sup>27</sup>楊泰之後來成爲精通經史的學者，著述甚多。<sup>28</sup>

邛州(治今四川邛崃)蒲江(今蒲江)魏了翁(1178-1237)乃晚宋最重要的理學家之一，與真德秀齊名。魏了翁爲其三兄所撰〈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(崇)行狀〉云：「[高崇]幼英悟，受學于鄉先生杜德稱希仲，爲文宏以肆，聲律所不能束。」<sup>29</sup>不僅高崇(1173-1232)，魏了翁自幼與內外群從兄弟皆從鄉先生杜希仲遊，「蟲飛而興，日三商而罷，夜窗率漏下二十刻，受館十餘年，猶一日也。厥後弟兄連年舉進士第，析主持節者相望」。<sup>30</sup>首先是魏了翁登寧宗慶元五年(1199)進士第，接著是了翁同產兄高載、高定子登嘉泰二年(1202)第，從弟魏文翁登嘉定四年(1211)第，同產兄高稼、

<sup>22</sup> 《丹淵集》卷四十〈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〉，頁294-95。

<sup>23</sup> 李石：《方舟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一四九冊，卷十五，頁八下(總頁698)。

<sup>24</sup> 同上注，卷十，頁二十四上(總頁647)。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九十九〈蘇氏蜀學略補遺·張錫道先生子覺〉作「錫道」(頁一百一一下)。

<sup>25</sup> 《方舟集》，卷十七〈雲巢子[李占]墓誌銘〉，頁三下(總頁726)。

<sup>26</sup> 魏了翁：《鶴山先生大全文集》(以下簡稱《鶴山集》)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宋刊本，卷八十一〈大理少卿直寶謨閣楊公[泰之]墓誌銘〉，頁672-75。

<sup>27</sup> 《宋代蜀文輯存》，卷六十二，頁798-99；史漸任成都府學教授見其所著〈涌泉寺碑〉。

<sup>28</sup> 參見許肇鼎：《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》(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6年)，頁392-93。

<sup>29</sup> 《鶴山集》，卷八十八，頁733。

<sup>30</sup> 同上注，卷八十三〈杜隱君(希仲)墓誌銘〉，頁692。

高崇登嘉定七年第。<sup>31</sup> 魏了翁撰〈榮州司戶何君(普)墓誌銘〉云：「余生四年，從鄉先生何君德厚授書數方名，未期歲，更他師。」<sup>32</sup> 則魏了翁的啓蒙老師是何普(字德厚，1142-1208)，隨後所更換的老師，應該就是杜希仲，了翁與內外群從兄弟從其學習十餘年。十七歲時，魏了翁又轉「從鄉先生章公[寅臣]遊，先生必迪以義理，語輒心解，似不以凡兒畜之」。魏了翁描述章寅臣(1156-1225)「嗜講學，雖事劇，不廢紬繹」。<sup>33</sup> 章寅臣將教學視為人生之嗜好，自然會傾注極大的熱情去從事之。教授魏了翁的這三位鄉先生，都是邛州蒲江人，與了翁同邑。魏了翁在二十二歲登第以前，就先後接受了三位鄉先生的教育，對他的成長有著重要影響。

魏了翁三兄高崇幼時亦受學於鄉先生杜希仲，後其父又遣高崇從李惟正學《周禮》，未冠，已馳聲士林。其後再入成都府學學習，登進士第。李惟正(1152-1212)字中父，蒲江人，少力學，誦書窮晨夜。長游成都學宮，受知於隆州井研(今四川井研)李舜臣(李心傳之父)、遂寧楊輔、楊甲兄弟、成都勾昌泰、眉山蘇誥。年四十一，登光宗紹熙四年(1193)進士第。<sup>34</sup>

魏文翁少與從兄魏了翁「同居共學」，既冠，又從鄉先生李坤臣學。李坤臣(1168-1221)亦字中父，邛州人，「貧無澹[擔]儲，受徒以自給」，曾被邛州大邑(今四川大邑)劉氏聘為家庭教師。魏文翁「聞郡人李中父坤臣以明經教授鄉里，除館致之」。魏了翁從子高斯得(高稼子)亦少從李坤臣學，後入太學，中理宗紹定二年(1229)進士第，官至執政，為宋末重要學者。<sup>35</sup>

蒲江魏高氏兩代七位登科入仕者，有三人官至執政(魏了翁、高定子、高斯得)，兩人曾任翰林學士(高定子、高斯得)，一人曾兼侍讀(魏了翁)，在學術上都有相當造詣，尤以魏了翁最著名。<sup>36</sup> 他們都曾經共同或分別從一至數位鄉先生學習，可以說，蒲江

<sup>31</sup> 參見胡師昭曦教授：〈詩書持家 理學名門——宋代蒲江魏氏家族研究〉，載《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8年)，頁239-61。魏了翁祖母之兄高黃中無子，將了翁之父過繼高家，生高載、高稼、高崇、高定子、高茂叔、魏了翁六子。後伯父魏士行無子，了翁還繼魏家。

<sup>32</sup> 《鶴山集》，卷七十一，頁579。

<sup>33</sup> 同上注，卷八十二〈雒縣丞章公[寅臣]墓誌銘〉，頁687；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八十〈鶴山學案補遺·縣丞章先生寅臣〉云：「章寅臣……嘗為鄉先生，魏華父了翁從之遊。先生講學，雖事劇，不廢紬繹。」(頁二下)卷九十九〈蘇氏蜀學略補遺·張錫道先生子覺〉云：「張子覺，方舟易師也。為鄉先生，以小學教授。」(頁一百一一下)此二例表明，《宋元學案補遺》的作者亦是明確以「鄉先生」一詞指稱私學教師的。

<sup>34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八十八〈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(崇)行狀〉，頁733；卷七十二〈簽書劍南西川判官李君(惟正)墓誌銘〉，頁586-87。

<sup>35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八十一〈朝議大夫知敘州魏公(文翁墓誌銘)〉，頁670；卷七十七〈李中父(坤臣)墓誌銘〉，頁635；《宋史》卷四百九〈高斯得傳〉，頁12322-28。

<sup>36</sup> 參見胡師昭曦師：〈詩書持家 理學名門——宋代蒲江魏氏家族研究〉。



魏高氏在魏了翁這一代的勃興，鄉先生的教育是很重要的因素。魏了翁曾談到：「某少聞諸父兄曰，吾鄉蒲江，其俗質實而近本，以除塾館士、教子務學競相標尚。高魏氏所館多賢，屈指姓名，尤稱彭山二宋君。」<sup>37</sup> 這表明，聘請鄉先生教子務學，乃蒲江民俗時尚，魏高氏亦不例外。魏了翁提到的彭山二宋君，就是高氏早期聘請的鄉先生，宋蘊（字元發，1136-1200）與其從弟宋希祖（字紹庭）。二宋乃眉州秀彥，未冠即有聲鄉曲，經史百家觸手成編，從之學者甚眾。二人同登孝宗淳熙五年（1178）進士第。高道充（魏了翁從兄，1154-1221）<sup>38</sup> 年十八喪父，從祖高深甫以其不凡，為其除塾招二宋教之，與深甫諸子同衣食几研。高道充從二宋學戴氏禮，兼通諸經，亦善詞賦。高道充「與紹熙三年〔1192〕、嘉泰四年〔1204〕賓薦，聲問益彰，士之負笈請益者踵相接，近郡邑競致書幣。隨資誨誘，論議娓娓，聽者亡倦」。<sup>39</sup> 高道充自己也作起鄉先生來，魏了翁曾從其學，至晚歲始杜門謝聘。

本文第二部分起始曾引用了虞集的一段關於蜀中鄉先生的描述。虞集接著這段話後說：

集與舍弟未髻鬣，先君攜之避地嶺海，諸書皆先親口授。十歲至長沙，始就外傅。從祖父秘監公必使求諸鄉人教之，猶守此法也。<sup>40</sup>

在宋末兵荒馬亂、顛沛流離的生活中，虞集的從祖父仍欲虞集兄弟接受蜀籍鄉先生的教育，可見這種教育影響之深。

<sup>37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八十〈果州流谿縣令通直郎致仕宋君〔蘊〕墓誌銘〉，頁656。

<sup>38</sup> 昌彼德、王德毅等編的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記高道充生卒年為1182-1221，「年四十」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4年，頁1763）。《鶴山集》卷七十二〈貴州文學高君〔道充〕墓誌銘〉記高道充「年十八，侍父訪醫眉山，父暴卒，跣護而歸」（頁586）。據《鶴山集》卷七十〈處士高君〔大中〕墓誌銘〉，高道充之父高大中「即眉山訪醫，居數日，暴厥而卒，時乾道七年正月壬辰〔十七日〕也」（頁562-63）。以乾道七年（1171）十八歲推之，高道充出生於高宗紹興二十四年（1154）。高道充墓誌銘中有「年四十不售，更為詞賦」一句，並非說高道充只活了四十歲。

<sup>39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七十二〈貴州文學高君〔道充〕墓誌銘〉，頁586。

<sup>40</sup> 《道園學古錄》卷五〈送趙茂元序〉，頁70。虞集緊接著寫道：「弱冠至臨川，鄉人惟二人在焉。一人為故宋樂安縣丞黃某，予同縣人也。江西帥臣黃棄疾以臨川內附，檄至樂安，縣丞獨不肯傳檄者。國人義而不忍殺之，去入深山中，忍臥不至死，教其子讀《春秋》而已。其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治，成都人，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塾中，宋亡，亦貧不仕。時時來與先君先舅語，舉書傳常連卷數千百言，不遺一字；天文、地理、律歷、姓氏、職官，一問累千百言不止。先親常勗某曰：『讀書當如范公之博，立身當如黃公之嚴。』斯言猶在耳也。於是稍從侍側。」以上下文審之，虞集所謂「必使求諸鄉人教之」中的「鄉人」，應指蜀籍人士。

許多著名學者曾經作過教書為業的鄉先生。

任奉古號「樂安先生」，是成都早期的著名鄉先生。經歷了唐末五代的動亂，宋初蜀士不樂仕進，張詠首次治蜀（淳化五年至咸平元年，994-998），訪察到有學行而為鄉里所服者李旼、張及、張逵等，敦勉其就科舉，結果三人悉登科入仕，蜀中士風為之一變。<sup>41</sup> 此三人及任玠、楊錫，均從任奉古治經義，成為宋初西川重要學者。<sup>42</sup> 綿竹楊繪的老師廣凱，亦為任奉古門人。<sup>43</sup>

李旼、任玠、張逵亦都作過鄉先生。張詠治蜀以前，李旼以著述為志，不樂仕進，隱居永康軍（今四川都江堰市）白沙山，從之學者甚眾。<sup>44</sup> 《茅亭客話》卷十〈任先生〔玠〕〉記任玠：「學識廣博，人皆師仰之。」普州馮君（馮如晦之父，991-1065）未冠求師於成都，「是時任玠溫如、李旼渭卿皆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，君執業門下，並為其高弟」。永康軍導江人代淵，稍長從李旼學經，從張逵學文章，知名於時。代淵考取天聖二年（1024）進士，以「祿不及親」，乃棄官還鄉，自己也成為以教書為業的鄉先生。蜀子弟從學者眾，坐席常滿。代淵「為示書精奧，教辭賦法度，得其道者去為聞儒顯人，於是蘊之〔代淵字〕名益彰」。<sup>45</sup> 成都楊損之甫冠，從李旼學。楊損之工詞賦，通《易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。曾「六預鄉書，兩居首選」，均不第。於是自己也作起鄉先生來，「講授諸生，四方從學者不下數百人。每榜計偕、登第者甚眾」。<sup>46</sup> 看來

<sup>41</sup> 韓琦：〈張公〔詠〕神道碑銘〉，載張詠：《乖崖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〇八五冊，附錄，頁十八上（總頁661）。

<sup>42</sup> 黃休復：《茅亭客話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〇四二冊，卷七〈哀亡友辭〉引張及為亡友楊錫所作〈哀亡友〔楊錫〕辭〉「序」，頁二上（總頁946）；參見胡昭曦、劉復生、粟品孝：《宋代蜀學研究》，頁19-21。

<sup>43</sup> 沈驥等（纂修）：嘉慶《綿竹縣志》，嘉慶十八年（1813）刻本，卷三十九〈典籍志〉，頁一上至一下。

<sup>44</sup> 王闢之：《澠水燕談錄》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6年），卷六〈文儒·李旼〉，頁八下至九上。王闢之誤記李旼科舉不第，始隱居教學，又將任玠之事混於李旼身上。

<sup>45</sup> 《茅亭客話》，頁六下（總頁963）；《丹淵集》卷三十九〈秘書丞馮君墓誌銘〉，頁291；宋祁：《景文集》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本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9年），卷五十九〈代祠部〔淵〕墓誌銘〉，頁十七上。

<sup>46</sup> 郭印：〈浣花四老堂記〉，載《宋代蜀文輯存》，卷三十九，頁三下（總頁513）。陳世松、賈大泉主編的《四川通史》第四冊云：「成都楊審之建四老堂，以經學『講授諸生，四方從學者不下數百人』。」（頁270）楊審之乃楊損之長子，因追念其父在生時與任傑、楊武仲、楊咸章之交誼，於普賢僧舍中建四老堂並繪像，以資紀念。故教學者既非楊審之，四老堂亦非講學之所。

楊損之名聲不遜於其師，而學生登第者眾，自己卻屢舉不利。後楊損之於元豐中試特奏，詔賜同學究出身而入仕。

隆州仁壽人員興宗，紹興二十七年(1157)進士，學問淵博，有《九華集》存世，著名史學家李心傳為其寫序。《四庫全書》之〈九華集提要〉云：

集中多與張栻、陸九淵往復書簡，蓋亦講學之家。……又洪括〔适〕撰《隸釋》時，嘗咨以漢碑數事，興宗為之考核源委，具見精博。今答書一通具在集中，學問淹雅，亦未易及。雖其文力追韓、柳，不無錘鍊過甚之弊，然骨力峭勁，要無南渡以後冗長蕪蔓之習，挺然一作者也。<sup>47</sup>

員興宗同邑人李日昇(1082-1155)之子早世，獨嫡孫李邦光侍養左右。李日昇常誨之曰：「來，汝能法我，力詩書以蕃吾門，吾志樂也。今里有通儒，曷親之？」<sup>48</sup> 李日昇所謂「通儒」，指的就是員興宗。李邦光於紹興十九年(己巳，1149)拜員興宗為師，時員興宗正習業待舉，同時教授生徒。

眉州青神杜莘老(1107-1164)好蘇氏文，有名於時，渠州(今四川渠縣)守石翼以師禮延致，乃自眉徙居恭州江津(今四川江津)。杜莘老中紹興十年(1240)進士，為南宋名臣。杜莘老喜藏書，精經術，有著作數種。<sup>49</sup>

劍州普成(治今四川劍閣縣南)人黃裳(1146-1194)字文叔，號「兼山」，累官太學博士、嘉王府翊善、禮部尚書兼侍讀，精經術，有《王府春秋講義》、《兼山集》、《兼山家學》、《樂記論》等著作(均佚)。<sup>50</sup> 黃裳又是傑出的天文學家，所繪天文圖被譯成多國文字，得到李約瑟等世界科學史名家的高度評價。<sup>51</sup> 黃裳登乾道五年(1169)進士，調閬州新井(今四川南部縣西)尉，因家喪而未赴任，乃教授鄉邑子弟，「語以經義，又為之講解」。<sup>52</sup> 除喪後授巴州(治今四川巴中)通江(今四川通江)尉，黃裳一方面鑽研學問，提高自身水準，另一方面又收徒授學，繼續其鄉先生的角色：

三年杜門，潛究經傳，出入古今，默而精思。或達旦不寐，人與語，若無聞然。于是剖微析幽，宏深四達，文詞明暢，動中律度。始時人傳其詩，不知其學已

<sup>47</sup> 員興宗：《九華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一五八冊，卷首，頁一上至二上(總頁1-2)。

<sup>48</sup> 同上注，卷二十一〈李日昇墓誌銘〉，頁九上(總頁180)。

<sup>49</sup> 查籥：〈杜御史莘老行狀〉，載杜大珪(編)：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四五〇冊，中卷五十四，頁一上至十下(總頁632-36)。

<sup>50</sup> 樓鑰：《攻媿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武英殿聚珍版本，卷九十九〈黃公〔裳〕墓誌銘〉，頁956-63；《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》，頁157-58。

<sup>51</sup> 參見劉復生：〈宋代四川科學技術的發展〉，載《宋代蜀學研究》，頁336-60。

<sup>52</sup> 《攻媿集》卷九十九〈黃公〔裳〕墓誌銘〉，頁956。

成，非復前日文叔矣。總領趙公公說聞其名，俾諸子從之游，賴其束修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。<sup>53</sup>

黃裳教授趙氏子弟是要收學費(束修)的，而且黃裳的學生並非僅有趙氏子弟，時任巴州知州的青神楊虞仲之子楊泰之(參見本文第三部分)亦從黃裳授經。時楊泰之尚幼，卻為黃裳所器重。

著名學者為鄉先生，其學問自然不差，而一般的鄉先生，亦不乏飽學之士，如前面提到的眉州彭山馮損之，以及蒲遠猷和章督的老師、鄉先生任維翰。馮損之自幼好學，讀五經，尤專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，探深抉奧，志其本統，泛閱古史百氏，該綜得失，著有歌詩若干卷。任維翰「若釋中古，皆通經，善講解，悉從之游，得其要旨妙論」。章督以經學著稱，就得之於任維翰。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第一位鄉先生——北宋成都人郭絳(字長孺)，其父力學，為文詞知名於鄉，郭絳幼讀父書，盡傳其學。平生無他嗜，惟好書，丹鉛點勘，筆不去手，自經史百氏之書，浮屠黃老之教，下暨陰陽地理醫卜之藝，吐納鍛煉之術，皆研盡其妙，有《易解》、《數書解》、《老子道德經解》等著作多種。<sup>54</sup> 值得注意的是，郭絳的知識構成，已是儒、佛、道三教合流了。<sup>55</sup> 成都勾居體「素號『鄉先生』，著書為多，諸生從之廣，多知名」。勾居體登神宗熙寧進士第，官至朝請大夫。此處鄉先生既有鄉賢之意，又有教書先生之意，而勾居體亦確為教書先生。遂州遂寧(今四川遂寧)鄉先生馮正符(神宗時人)於諸經多解說，著有《易解》、《詩解》、《論語解》等，而最著名者為《春秋得法忘例論》三十卷。後以薦得官，王安石厚待之，其學問為南宋著名學者李燾所稱道。馮正符的老師、鄉先生何群，為石介高徒，亦為李燾所推崇(詳見下述)。梓州中江(今四川中江)吳之巽(1160-1221)從其父學小戴氏書，精於經術，其教授於廣漢王氏之塾，郡守往往率諸生登門請教。<sup>56</sup> 魏文翁和高斯得的老師、蒲江鄉先生李坤臣於群經義疏、諸史百氏靡不究研，於三禮尤該暢，嘗欲為《周禮》傳而未及，晚尤邃於《易》。魏了翁與其切磋學問，劉光祖、虞剛

<sup>53</sup> 同上注。

<sup>54</sup> 《淨德集》卷二十六〈長樂馮先生(字損之)墓誌銘〉，頁四上至五上；卷二十八〈沖退處士章督行狀〉，頁三上至四下；《宋史》卷四百五十八〈章督傳〉，頁13446-47；楊天惠：〈樂善郭先生誄〉，載《宋代蜀文輯存》，卷二十六，頁二十三上至二十三下(總頁371)；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四〈廬陵學案補遺·孝子郭樂善先生絳〉，頁一百二十二上至一百二十三上。

<sup>55</sup> 宋代民間三教合流的情況，是否亦可從鄉先生教育的角度加以探討？

<sup>56</sup> 《氏族譜·勾氏》，載《巴蜀叢書》第一輯，頁258；《宋元學案》卷二〈泰山學案·主簿馮先生正符〉，頁125-26；陸心源(輯)：《宋史翼》(臺北：交海出版社，1967年)，卷二十六〈馮正符傳〉，頁十五上至十五下(總頁1133-34)；《鶴山集》卷七十二〈中江吳先之(之巽)墓銘〉，頁584-85。

簡等著名學者亦禮待之。高道充的老師、彭山鄉先生宋蘊精於經學，著有《論語略解》二十卷、《尚書講義》五十卷。

最令筆者感到意外的是，在諸多鄉先生中，居然還發現了一位女性。太子中允大夫許平施(字益之)之妻劉氏(1025-1072)，為簡州陽安(今四川簡陽)人著作佐郎劉琚之女。文同撰〈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〉云：

〔劉氏〕嗜學，書傳無有不經覽者，於《左氏春秋》尤能通誦之。中間事跡詞語，沿端極涯，開說講辯；名氏世族，地里歲月，條分緒解，癸甲不亂。……從知平定軍樂平縣，未幾，益之卒，夫人攜諸孤奉輜車還成都。至則舊產已空，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。寄人舍下，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推〔稚〕齒者，授訓誡，教書字，逾十年。獲所遺以給朝夕，僅取足，不營於他。其所居左右之人，凡過其門，悉俛首遽進，不敢誼諠作高語大笑，懼聞于夫人。清風滿家，寒苦霜雪，督諸子學，晝夜不廢。改詰檢問，使中程律，一或不及，譙勵不貸。故其子天啓嘗預郡府貢書，古〔名〕在高等，夫人教之也。自是夫人之徽烈懿行愈聞于人，萬口一詞，謂絕倫類。<sup>57</sup>

由文同以上敘述，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幾點：第一，人們常說，在傳統中國，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」，乃社會普遍遵奉的信條。而劉氏的確有學問，不遜於鬚眉。陽安劉氏為簡州名族，富家學傳統。<sup>58</sup> 劉氏雖一介女子，亦承襲了家學，成為才女子。其實，在宋

<sup>57</sup> 《丹淵集》，卷四十，頁295-96。引文改正之字，校自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。

<sup>58</sup> 簡州陽安劉昊以學行為鄉先生，真宗咸平、天禧中兩預鄉薦，不第，遂隱居，號「後溪洞主」，天聖中授國子四門助教。王象之《輿地紀勝》(南京：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，1991年)記劉昊「子孫之登第者，七世九人矣」。劉昊次子劉諷登仁宗天聖五年(1027)進士第，年六十三致仕而歸。宋祁有詩云：「稱疾本避世，辭官終引年，還家三徑在，教子一經賢。」蘇渙詩云：「林下人歸少，君歸不待年，能令兩蜀士，嘆甚二疏賢。」(均見該書卷一百四十五〈簡州·人物·劉昊 劉諷〉，頁九下〔總頁1032〕)這表明劉諷有時名，致仕後以教子為務。劉諷子劉孝孫，熙寧五年(1072)以都官員外郎為御史(陸心源：《宋詩紀事小傳補正》〔臺北：中華書局，1971年〕，卷一〈劉孝孫傳〉，頁十三下〔總頁13〕)。劉孝孫精於經術，對喪禮尤有研究，著述頗多(《宋代蜀人著作存佚錄》，頁245-46)。劉孝孫次子劉涇字巨濟，號「前溪先生」。登熙寧六年進士(1073)第，以文知名，王安石薦其才，歷任經義所檢討、太學博士、常州教授、國子監丞等，有《前溪集》等著作多種(《宋史》卷四百四十三〈劉涇傳〉，頁13104-05；《宋人著作存佚錄》，頁246-47)。南宋名臣、名學者劉光祖，號「後溪先生」，為劉涇弟劉漢曾孫，登孝宗乾道五年(1169)進士第，著述甚豐。劉光祖少從族兄劉伯熊學(真德秀：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明正德刊本，卷四十三〈劉閣學〔光祖〕墓誌銘〉，頁656-66；《宋人著作存佚錄》，頁251-52)。劉伯熊號「東溪先生」，為資州李石門人，著有《東溪易傳》、《東溪先生集》，南宋著名學者葉適為其

[下轉頁152]

代士大夫家族中，才女子頗常見，尤其是富有學術傳統家族出身的女子。許多母親都在家庭中承擔起教子習進士業的責任，劉氏不過是推及於社會，既教己子，又教他人罷了。第二，劉氏以教書為業，乃為了解決生計問題，與諸多男性鄉先生無異。第三，劉氏以教書為業，不僅得到人們認同，並獲得人們的高度尊敬。劉氏的例子雖不具普遍性，但它所引發的思考卻是很多的。

綜上所述，從北宋初期的樂安先生任奉古起，鄉先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四川學者。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繁榮發達，其中也有鄉先生私學教育的一分功勞。

## 五

宋代科舉發達，影響及於社會各個方面。一般而言，考取科舉功名，就成為鄉先生的教學以及學生學習之重要目的。如眉山史天常(北宋哲宗、徽宗時人)，「以經術授諸生，多有登科者」。本文第二部分引南宋李石在其所撰〈支興道(時起)墓誌銘〉中，談到他的老師鄉先生張子覺云：「張子寬[覺]先生，易師也，以小學教授，雖童稚勝衣者登其門，皆以著數授之，凡前輩讀《易》有聲場屋者，自其門出。」可見張子覺的許多學生參加科舉考試，且在科場上以《易》學知名。前述魏了翁與內外群從兄弟皆從鄉先生杜希仲學習十餘年，「厥後弟兄連年舉進士第，析圭持節者相望」，學習從舉的目的亦很明顯。教魏了翁之兄高崇的第二位鄉先生李惟正，於「淳熙七年(1180)以後，凡四冠鄉舉，士之為科舉者皆想聞風采，負笈從之遊，邛、蜀(二州)大家爭走書幣」。<sup>59</sup> 爭聘李惟正的大家族，其目的就是為了子弟能登科第。而許多鄉先生本身亦積極從事舉業，李惟正就在四十一歲時登光宗紹熙四年(1193)進士第，其他例子詳見下述。

擔任鄉先生者，有的是終身以此為業，如成都樂安先生任奉古、永康軍導江代淵、邛州蒲江杜希仲(魏了翁老師)、長寧軍劉仲達等。

有的是登科以前以此為業，如成都李旼、張達、隆州仁壽員興宗、眉州青神杜莘老。又如魏了翁的啟蒙老師、鄉先生何普，在魏了翁四歲時，何普曾教過他不到一年。

[上接頁151]

集作序。朱熹與劉光祖書云：「《東溪語說》伏讀再三，乃知師友淵源所自，深遠如此。」(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九十九〈蘇氏蜀學略補遺·劉東溪先生伯熊〉，頁一百四十四下；葉適：《水心文集》，《四部叢刊初編縮本》影印明正統本，卷十二〈東溪先生集序〉，頁139-40)《輿地紀勝》卷一百四十五〈簡州·詩〉有云：「入蜀最宜遊簡郡，尋山須是訪劉家。」其附注云：「此古詩也，簡池獨劉氏三溪號一郡之勝。」(頁十一上〔總頁1033〕)劉氏為簡州名族，由來已久，所謂三溪，或即前溪、後溪、東溪，故劉氏多以之為號。許平施之妻劉氏約與劉孝孫同時。

<sup>59</sup> 黃庭堅：《山谷別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一三冊，卷九〈史端臣(直躬)先生墓誌銘〉，頁十四上(總頁624)；《鶴山集》卷七十二〈李君(惟正)墓誌銘〉，頁586。

寧宗慶元五年(1199)，時年五十八歲的何普與二十二歲的魏了翁同科考試，魏了翁中進士第三，而何普以特奏名入等。<sup>60</sup> 宋代特奏名是授予多次科舉不第，且年齡較大者，<sup>61</sup> 這表明何普在作鄉先生的同時，一直未放棄科舉考試。教授魏了翁的另一位鄉先生章寅臣，亦屢舉不第，直到寧宗嘉定十年(1217)才登第，時年已六十二歲。<sup>62</sup> 何、章二人都是一邊作鄉先生，一邊從事科舉的。教魏了翁之兄高崇(1173-1232)的第二位鄉先生李惟正(1152-1212)是光宗紹熙四年(1193)登進士第的，而高崇未冠以前已從其學，故當時李惟正尚未登第。<sup>63</sup> 彭山二宋之宋蘊、宋希祖，也是在登科以前受聘於邛州蒲江高氏的。

有的是科舉失敗以後以此為業，如眉州彭山馮損之。又前述遂州遂寧人馮正符，其父為「蜀中老儒」，「以經術操行高于蜀，聞于朝廷，仁宗時再賜粟帛，熙寧初召試舍人院，不起」。<sup>64</sup> 其兄弟馮正雅於仁宗嘉祐四年(1059)明經中第，正雅弟正卿登神宗元豐五年(1082)進士第。<sup>65</sup> 馮正符三上禮部不第，以經學教授梓、遂間，閉戶十年，著書立說。熙寧中因鄧綰之薦，得試舍人院，賜同進士出身，始入仕。馮正符曾從果州西充(今四川西充)人何群學。何群嗜古學，慶歷中至太學，從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學，為石介所器重。何群雖工於賦，卻以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，因上書請將賦從科舉考試內容中罷去。以議不行，離太學返鄉，遂不復舉進士。嘉祐中，龍圖閣直學士何刻表其行義，賜號「安逸處士」。李燾讚何群「學甚高」。<sup>66</sup> 從時間上推算，馮正符從學於何群，是在何群從太學歸鄉後，說明這以後何群亦招徒授學。

宋代科舉規模擴大，士子習進士業的多，自然需要大批的鄉先生，即使是富有家學傳統的家族如華陽范氏、資州李氏等，亦常常讓子弟從鄉先生學習，足見鄉先生教育之重要性。而大批從事學業或科舉落第的士人，又源源不斷地補充到鄉先生的隊伍中。既有居家授徒者，如梓州郫縣(今四川三台)祿樵之「以經學教授于家」。亦有受聘上門為師者，如前述梓州中江吳之翼，就受聘於廣漢王氏。又前述眉山趙蒙之父馬服先生，在

<sup>60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七十一〈榮州司戶何君(普)墓誌銘〉，頁579。

<sup>61</sup> 參見苗書梅：《宋代官員選任和管理制度》(開封：河南大學出版社，1996年)，頁34-44。

<sup>62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八十二〈雒縣丞章公(寅臣)墓誌銘〉，頁687；《宋元學案補遺》卷八十〈鶴山學案補遺·縣丞章先生寅臣〉，頁二下。

<sup>63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七十二〈李君(惟正)墓誌銘〉，頁586-87。

<sup>64</sup> 《宋元學案》卷二〈泰山學案·主簿馮先生正符〉，頁125-26；王之望：《漢濱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一三九冊，卷十五〈遂寧馮君(籽)墓誌銘〉，頁十一上(總頁870)。

<sup>65</sup> 〈遂寧馮君(籽)墓誌銘〉記馮正雅為明經中第，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一百二十二〈選舉志一〉記為特奏名(頁十九下[總頁3694])，又記馮正符為熙寧九年進士(頁二十三下[總頁3696])，卻未標明是特奏名。

<sup>66</sup> 《宋史》卷四百五十七〈何群傳〉，頁13435-36；《宋元學案》卷二〈泰山學案·處士何安逸先生群〉，頁119-20；〈泰山學案·主簿馮先生正符〉，頁125-26。

趙蒙出生數月之後，即「去客諸郡，為人挽留主師席，凡不歸者十四年」。<sup>67</sup> 青神杜莘老因受聘而遷居恭州江津。臨邛火井郭大昕之父郭紘，聚徒教授於富義（今四川富順），亦定居於此。<sup>68</sup> 隆州井研鄉先生黃濟叔早從李心傳、李道傳學，其學問為本縣牟桂、牟子才父子所欽敬，乃奉書幣延至家塾。黃濟叔「以師道自處，誨諸生有法，每講誦過夜分，未嘗假以詞色」。牟子才為南宋名臣和蜀籍名學者，學於魏了翁、虞剛簡及朱熹門人李方子等，有《存齋集》、《易編》等著作多種。其子牟獻（1227-1311）兼承家學和鄉先生之教，後成為著名學者，討論六經，尤雄於文，學者稱「陵陽先生」。<sup>69</sup>

## 六

為進一步說明鄉先生教育在私學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，有必要與宋代四川的書院教育（專指私立書院）作一對比。<sup>70</sup>

（一）始建時間不詳的有：

蓬州果山書院。<sup>71</sup>

夔州少陵書院。

夔州靜暉書院。<sup>72</sup>

<sup>67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八十四〈知威州祿君（堅復）墓誌銘〉，頁701；《丹淵集》卷四十〈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〉，頁294。

<sup>68</sup> 《山谷別集》卷九〈朝請郎郭方進（大昕）墓誌銘〉，頁二下至三上（總頁618）。北宋乾德四年（966）升富義縣為監，太平興國元年（976）改為富順監，治所即今富順。郭大昕在英宗治平四年（1067）與著名文人黃庭堅同登進士第。

<sup>69</sup> 牟獻：《牟氏陵陽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一八八冊，卷二十四〈黃提幹（字濟叔）行狀〉，頁二上（總頁209）；《宋史翼》卷三十四〈牟獻傳〉，頁七上至八上（總頁1475-77）。另參見鄒重華：〈家族與學術文化——對宋代四川地區幾個典型家族的考察〉，《天府新論》第二期（1992年3月），頁78-82。

<sup>70</sup> 蒙默等的《四川古代史稿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，頁316-19）和陳世松、賈大泉的《四川通史》第四冊（頁270-73）二書對宋代四川書院作了較系統的清理，筆者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考訂。凡未特別注明者，均請參見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。

<sup>71</sup> 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記宋知州王旦建（頁十五上〔總頁2630〕）。有北宋人王旦（957-1017），太平興國五年（980）進士，真宗時官至宰相。但查《宋史·王旦傳》，並無知蓬州之記錄。兩個王旦是否同一人，亦是疑問。《四川通史》第四冊稱，太宗端拱（988-989）中王旦建果山書院，不知何據？

<sup>72</sup> 和坤等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三百三記為「宋建」（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四百八十一冊，頁六下〔總頁221〕）；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記為「宋知州王十朋修建題詩」（頁二十二上〔總頁2633〕）；黃廷桂等修、張晉生等纂的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五〈學校〉僅記為「王十朋有詩」（乾隆元年〔1723〕補版增刻本，頁二十七上）。王十朋（1112-1171）於南宋孝宗時知夔州。



富順柳溝書院。<sup>73</sup>

(二)建於南宋的書院有：

眉州東觀(一作館)書院，高宗紹興(1131-1162)初，「東觀[鎮]鄉士仿古鄉校並為肄業之所」。<sup>74</sup>

眉州丹稜柵頭書院，紹興間縣令馮時行建。<sup>75</sup>

瀘州江安龍門書院，孝宗乾道(1165-1173)中鄉士呂佑建。<sup>76</sup>

合州濂溪書院，建於孝宗淳熙(1174-1189)時或以前。<sup>77</sup>

遂寧府遂寧縣張九宗書院，據傳始建於唐貞觀九年(635)，宋寧宗嘉泰(1201-1204)初改建儒學。

鶴山書院，共兩處。魏了翁(1178-1237)守生父喪歸里，於寧宗嘉定三年(1210)在家鄉邛州蒲江白鶴山建成鶴山書院。魏了翁建書院之原意，本為貯書讀書之所，偶然因借為鄉貢之士講肄之所，中選者眾，而聲名大噪，求學者絡繹不絕，於是擴大建築規模，以滿足需要。<sup>78</sup>「因仕宦的緣故，魏了翁實際主教書院的時間不是很長，前後共約四年多，但書院對傳播理學思想卻發揮了積極的作用」。<sup>79</sup>魏了翁於紹定六年

<sup>73</sup> 葛紹歐〈宋代四川地區的州縣學〉一文稱柳溝書院為「宋治平中李文淵建」(《宋史研究集》[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1988年]，第十八輯，頁261-348)，不知何據？而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及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三百一只記為「宋李文淵建」(頁十八下[總頁2631]、頁八下[總頁196])，並無治平(英宗年號，1064-1067)二字。《宋人傳記資料索引》中僅有建州松溪人李文淵(1085-1146)，但治平時他尚未出世，也無仕宦四川的記錄。參見韓元吉：《南澗甲乙稿》、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本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9年)，卷十九〈李公[文淵]墓碑〉，頁十六上至二十下。

<sup>74</sup> 《大清一統志》，卷三百九，頁四下(總頁342)。《四川通史》第四冊標注此段史實見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·書院〉，誤。

<sup>75</sup> 《大清一統志》，卷三百九，頁四下(總頁342)；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，頁三十八下(總頁2641)。

<sup>76</sup> 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五〈學校〉，頁二十九上

<sup>77</sup> 劉芳聲等：萬曆《合州志》(合川：合川縣圖書館，1978年石印本)，卷二，頁三十二下；並參見《四川古代史稿》，頁318。

<sup>78</sup> 魏了翁〈書鶴山書院始末〉云：「嘉定三年(1203)春，詔郡國聘士，邛之預賓貢者比屋相望，未有講肄之所。會鶴山書院落成，乃授之館，其秋試于有司，士自首選而下，拔十而得八，書室俄空焉。人競傳為美談。了翁曰：『是不過務記覽、為文詞，以歸取利祿云爾。學云學云，記覽文詞云乎哉？』則又取友于四方，與之共學。負笈而至者，襁屬不絕。乃增廣前後，各為一堂二內，廊廡門墉，以次畢具。」(《鶴山集》，卷四十一，頁349)

<sup>79</sup> 《宋代蜀學研究》，頁153。諸方志載邛州有兩處鶴山書院，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均記為魏了翁講學處，實則另一處可能建於明代。參見《四川古代史稿》，頁317，注2。

(1233, 逝世前五年)知瀘州時, 曾在這裏「興學校」<sup>80</sup> 大概就是所謂瀘州鶴山書院。端平元年(1234)五月, 了翁奉詔還朝, 在瀘州約一年。

梓州雲山書院, 邑人楊子謨(1153-1226)建。楊子謨為孝宗淳熙八年(1181)進士, 「先是公於(鄆)縣之南山築室聚友, 號『雲山書院』」。退休後, 「即雲山書院講授後進, 吉月、月半誦《論》、《孟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學》, 語或至吁, 聽之者各充然有得」。<sup>81</sup> 雲山書院成為講學之所, 則是在寧宗時。

成都滄江書院, 隆州仁壽理學家虞剛簡(1164-1227)建。剛簡「自上華陽, 印(即)築室成都之合江, 以成雍公[其祖虞允文]卜居未遂之志。秀才范公[蔭]為榜曰『滄江書院』」。虞剛簡謝絕一般的應酬, 閉門潛心於探究學術和著述。「士之請益者, 肩摩袂屬, 謁無留門, 坐無虛席, 爨無停炊。自二十年來, 知與不知, 皆曰『滄江先生』。卒之日, 蜀之士民塗泣巷弔, 學於成都者二百餘人, 聚哭於滄江」。<sup>82</sup> 虞氏之滄江書院與楊子謨之雲山書院一樣, 初期只是個人讀書研習學問之室, 後才成為教人子弟之所。從其形式與規模而言, 與鄉先生的教學沒甚麼區別, 像北宋成都鄉先生李旼, 「從之學者甚眾」, 永康軍代淵, 「蜀子弟從學者眾, 坐席常滿」, 成都雙流鄧琛以經學授徒, 「群聚至數百人, 翕然知學」, 只是這些鄉先生, 未給自己講學之所冠以書院之名而已。要說有何不同, 則在於前後學術取徑發生了變化。虞剛簡為理學家, 與創建鶴山書院的魏了翁、建梓州雲山書院的楊子謨、建黎州玉淵書院的薛紱為講友, 他們創建書院, 大概都受到朱熹、呂祖謙復興書院行動的影響, 其講學內容, 以傳播理學思想為主。

嘉州夾江同人書院, 邛州蒲江高定子(魏了翁兄)於寧宗嘉定(1208-1224)時知夾江縣, 建此書院, 蓋以教化為務。<sup>83</sup>

瀘州五峰書院, 寧宗慶元(1195-1200)中知州楊汝明建。<sup>84</sup>

黎州玉淵書院, 寧宗開禧(1205-1207)初知州薛紱建。理宗紹定二年(1229), 魏了翁三兄高崇通判黎州, 見玉淵書院「久廢不治, 公修其牆屋軒戶, 將與邦之秀彥肄業其間」。<sup>85</sup> 高崇距薛紱治黎僅二十餘年, 大概薛紱離任後, 書院便廢了。

<sup>80</sup> 《宋史》卷四十一〈理宗紀〉紹定六年十一月, 卷四百三十七〈魏了翁傳〉。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記: 「鶴山書院, 在瀘州治學宮前, 舊在瀘州治, 南宋開禧(1205-1207)中知州魏了翁建。」(頁四十上〔總頁2642〕)所述時間大謬, 鶴山書院之名, 亦有可能是後人追加的。

<sup>81</sup> 《鶴山集》卷七十四〈楊公〔子謨〕墓誌銘〉, 頁604-7。

<sup>82</sup> 同上注, 卷七十六〈虞公〔剛簡〕墓誌銘〉, 頁620-25。

<sup>83</sup> 《宋史》卷四百九〈高定子傳〉, 頁12317, 12322。

<sup>84</sup> 《四川古代史稿》, 頁318。

<sup>85</sup> 《宋元學案》卷七十二〈二江諸儒學案·祕書薛符谿先生紱〉, 頁2415-16; 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三百六, 頁六上(總頁275); 《鶴山集》卷八十八〈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〔崇〕行狀〉, 頁735。

涪州北巖書院，「程伊川先生謫涪，闢堂注《易》，黃庭堅匾曰『鉤深』。〔寧宗〕嘉定十年〔1217〕，范仲武請為北巖書院」。范仲武(1164-1225)為豐城人，遷瑞州高安，登慶元五年(1199)進士第，曾知涪州。<sup>86</sup>

嘉慶《四川通志》記：「竹林書院，在夔州府治東，宋嘉熙中知州孟珙建，以處襄漢流寓之士。又有南陽書院，亦珙建。」<sup>87</sup>理宗嘉熙四年(1240)，孟珙(1195-1246)任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、兼京湖安撫制置使。淳祐元年(1241)春，四川宣撫司解散，宋廷又以孟珙為京湖安撫制置大使，兼夔州路制置大使，兼本路屯田大使。淳祐二年(1242)，孟珙在公安(今湖北公安)建公安書院，以收納逃難的蜀中士人；又在武昌(今湖北武昌)建南陽書院，以接待京襄地區的士人。<sup>88</sup>故這些書院都帶有救濟性質，而南陽書院並不在四川境內。

夔州蓮峰書院，《四川古代史稿》云：「夔州府治後臥龍山麓，宋知府王十朋建。」查其史源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五，並無此段記載。《四川通史》第四冊則標注該段史料見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三百五。實際上該卷記的是寧遠府，卷三百三才是記夔州府，但也沒有提及蓮峰書院。而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記，蓮峰書院為清乾隆初年知府徐良建。《嘉慶重修一統志》卷三百九十七亦記為乾隆三十二年(1767)建。<sup>89</sup>

另有一些所謂的書院，實為宋代名人讀書處。《四川古代史稿》云：「入宋以後，稱為書院的有兩種涵義，一種是文人的讀書處，如鹽亭縣『東臺書院……宋任伯儔讀書處』，『太元書院……文同讀書處』(《大清一統志》卷308)；一種是教育機構。」<sup>90</sup>

嘉州洪雅修文書院，《四川通史》第四冊稱太宗太平興國時建。但查其史源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云：「修文書院，在洪雅縣東，舊在城外東南。宋田錫讀書修文山麓，後即其地建書院。後修圯屢更城外里許，有遺直書院碑，字今尚存。明天啓五年〔1625〕，知縣陝嗣宗捐資改建文廟清雲街，牟光大撰記，明末燬。」書院建於何時，並不清楚。田氏為唐僖宗時遷蜀家族，田錫於太平興國三年(978)登進士第，為宋代洪雅第一位進士。查范仲淹撰〈田司徒〔錫〕墓誌銘〉及司馬光

<sup>86</sup> 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志四·書院〉，頁十上至十下(總頁2627)；曹彥約：《昌谷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一六七冊，卷十九〈朝議大夫直煥章閣范季克〔仲武〕墓誌銘〉，頁十八上至二十四上(總頁234-37)。

<sup>87</sup> 嘉慶《四川通志》卷七十九〈學校·書院〉，頁二十二下(總頁2633)。

<sup>88</sup> 參見胡昭曦、鄒重華(主編)：《宋蒙(元)關係史》(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2年)，頁169-70。

<sup>89</sup> 《四川古代史稿》，頁317；《四川通史》，第四冊，頁272；嘉慶《四川通志》，卷七十九，頁二十一下(總頁2633)；穆彰阿等：《嘉慶重修一統志》，《四部叢刊續編》本(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4年)，卷三百九十七，頁五下。

<sup>90</sup> 《四川古代史稿》，頁316-17。

撰〈田司徒(錫)神道碑陰〉，均未提到修文書院，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三百七則明確記曰：「又洪雅縣有修文書院，在修文山下，明天啓間建。」<sup>91</sup>

眉州丹稜巽巖書院，嘉慶《四川通志》記，紹興間丹稜李燾(1123-1175)建。周必大撰〈李文簡公(燾)神道碑〉云：「〔李燾〕紹興八年〔1138〕第進士，調成都府華陽縣主簿，未上，讀書本縣龍鵠山，命曰『巽巖』。……久之，赴華陽。」碑文中並未提及建書院之事。李燾子李壁所撰〈巽巖先生墓刻〉，亦未提及建書院之事，只言李燾逝後葬於龍鵠山巽巖之陽。<sup>92</sup> 故所謂巽巖書院，實為李燾讀書處，李燾並以巽巖為號。

前引葛紹歐〈宋代四川地區的州縣學〉一文記錄宋代四川書院二十六處，即將上述修文書院、巽巖書院、東台書院、太元書院以及敘州宜賓蟠龍書院(宋程公許讀書處)、漢州綿竹紫巖書院(宋張浚讀書處)等文人讀書處計算在內。<sup>93</sup>

根據以上之清理，通算起來，宋代四川建的書院，較為可靠的共有十八處(蓮峰書院、南陽書院、修文書院、巽巖書院除外)。北宋是否建有書院，暫且存疑。知道大致始建時間的十四處，均建於南宋。其中高宗時有眉州東觀書院及眉州丹稜柵頭書院二處，孝宗時有瀘州江安龍門書院、合州濂溪書院二處，寧宗時有張九宗書院、邛州蒲江鶴山書院、瀘州鶴山書院、梓州雲山書院、成都滄江書院、嘉州夾江同人書院、瀘州五峰書院、黎州玉淵書院、涪州北巖書院九處，理宗時有竹林書院一處，即建於寧宗以前的有四處，以後的有十處。而這十四處書院中，確知為官辦的就有柵頭、瀘州鶴山、同人、五峰、玉淵、北巖、竹林等七處書院。濂溪書院創建者不明。餘下確知為私人所辦的書院僅有五處，即眉州東觀、瀘州江安龍門、邛州蒲江鶴山、成都滄江及梓州雲山。另寧宗嘉泰初改建的遂寧張九宗書院，大概也是官學性質。葛紹歐〈宋代四川地區的州縣學〉稱「在四川地區的書院均屬私立」，《四川通史》第四冊稱「宋代四川書院，大多數是私人創辦的講學場所」，<sup>94</sup> 顯然是不正確的。在所有這十八處書院中，僅私辦的邛州蒲江鶴山書院、成都滄江書院較有規模和影響，但存在的時間卻不長。

綜上所述，宋代四川的私學書院教育，北宋大概是空白，南宋亦少得可憐。將其與前述鄉先生教育加以對比，可以看出，宋代四川(除家學以外)之私學教育，主要是由鄉先生所承擔，而非書院。

<sup>91</sup> 《四川通史》，第四冊，頁271；嘉慶《四川通志》，卷七十九，頁二十八下(總頁2636)；田錫：《咸平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〇八五冊，卷首附(總頁355-58)；《大清一統志》，卷三百七，頁六上(總頁297)。

<sup>92</sup> 周必大：《文忠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本，第一一四七冊，卷六十六，頁九上至九下(總頁701)；解縉等(纂修)：《永樂大典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影印線裝本，1960年)，卷一萬四百二十一「李」字引李壁《雁湖集》，頁四下至五上。

<sup>93</sup> 該文所錄宋虞允文所建眉州丹稜東山精舍，大概亦是其讀書處；而成都錦江書院和嘉定府健為子雲書院，則為明代所建。參見《四川古代史稿》，頁411。

<sup>94</sup> 〈宋代四川地區的州縣學〉，頁327；《四川通史》，第四冊，頁271。

劉子健先生撰〈略論宋代地方官學和私學的消長〉一文，認為書院在北宋時期私學教育中的作用，有被誇大之嫌。劉氏云：

北宋最初的四十年，地方上很少有正式學校。所謂四大書院之稱，言過其實。《文獻通考》首先承認：「是時未有州縣之學，先有鄉黨之學。」接下去卻列舉廬山白鹿洞，徐〔衡〕州石鼓書院，應天府書院，和潭州嶽麓書院，說「宋興之初，天下四書院。……此外則又有……嵩陽茅山，後來無聞。獨四書院之名著。」《玉海》也提到四大書院，而列舉不同，以為是白鹿洞，嶽麓，應天，和嵩陽。其實都是南宋名儒朱熹呂祖謙他們，在若干舊址廢址，重新興辦私學，推崇久已中斷的往事。應天府書院根本是半官性的，不能算鄉黨之學（見下文）。只因名臣范仲淹在那裏讀過書，有文頌揚，所以也在推崇之列。但根據有關五代的史料，《宋會要輯稿》，和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，一類的史料，可以看出宋初少數書院，規模是很有限的。<sup>95</sup>

人們談及宋代私學教育，言必稱譽書院，劉先生此論，可謂獨具慧眼。以宋代四川情況而論，不僅北宋時期，南宋時之書院教育規模亦相當有限。所謂「在宋代四川教育史上，書院有著極其重要的地位。……宋代四川書院教育，為四川培養了一大批著名學者」，<sup>96</sup> 套用劉子健先生的用語，亦可謂「言過其實」。如果將這些話用在鄉先生身上，倒是「名符其實」。筆者以為，有關宋代書院教育的作用，不免人云亦云，其作用被誇大了。<sup>97</sup> 即使是書院教育較為發達的江西、福建等地區，其作用究竟有多大，仍然值得重新審視。總之，現在是該重新檢討過去有關宋代書院研究的時候了。

### 結語

通過本文的討論，人們對「鄉先生」這一宋代民間私學教育角色當有初步的認識。

古時以尊稱辭官居鄉或在鄉任教的老人的「鄉先生」一詞，至宋代已演變為民間私學教師的通稱（儘管稱鄉賢之意仍保留了下來）。

<sup>95</sup> 劉子健：〈略論宋代地方官學和私學的消長〉，載劉子健：《兩宋史研究彙編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7年），頁211-27。

<sup>96</sup> 見陳世松、賈大泉：《四川通史》，第四冊，頁273。

<sup>97</sup> 如吳寬《中國古代私學發展諸問題研究》僅據袁燮〈四明教授廳續壁記〉中所說：「由建隆以來，迄於康定，獨有所謂書院者，若白鹿洞、嶽麓、嵩陽、茅山之類是也；其卓然為〔後學〕師表者，若南都之戚氏、泰山之孫氏、海陵之胡氏、祖徠之石氏，集一時俊秀，相與講學，涵養作成之功，亦既深矣。而闕其鄉校，惟兗、潁二州有之，餘無聞矣〔焉〕。」即云：「足見書院是當時〔北宋時期〕主要的教育形式。」（頁95）袁燮之文載袁燮：《絜齋集》，《百部叢書集成》影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本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9年），卷十，頁八上。括號中的字為筆者據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本校正。

縱貫兩宋的四川城鄉各地，都可尋到鄉先生教學的蹤跡。其教學層次不僅僅是啓蒙，亦包括了教授高深的學問。

宋代四川許多著名學者如蘇軾和蘇轍兄弟、范鎮、文同、李石、魏了翁等，都曾接受過鄉先生的教育。尤其是魏了翁家族在南宋的勃興，鄉先生的教育起了很重要的作用。許多著名蜀籍學者曾經作過教書爲業的鄉先生，如「樂安先生」任奉古、李旼、代淵、員興宗、杜莘老、黃裳等。而在諸多教書爲業的鄉先生中，竟然還發現了一位女性。鄉先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四川學者，爲宋代四川學術文化的繁榮發達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宋代科舉發達，影響及於社會各個方面。一般而言，考取科舉功名，是鄉先生教學以及學生學習之重要目的。擔任鄉先生者，有的是終身以此爲業，有的是登科以前以此爲業，有的是科舉失敗以後以此爲業。鄉先生既有居家授徒者，亦有受聘上門爲師者。宋代科舉規模擴大，士子習進士業的多，自然需要大批的鄉先生。即使富有家學傳統的家庭如華陽范氏、資州李氏等，亦常常讓子弟從鄉先生學習，足見鄉先生教育之重要性。而大批從事舉業的或科舉落第的士人，又源源不斷地補充到鄉先生的隊伍中。科舉刺激了鄉先生教育的發展，從而使宋代民間教育普及程度大爲提高。

將宋代四川私學書院教育與鄉先生教育加以比較，可以看出，四川的私學書院教育，北宋大概是空白，南宋亦少得可憐，宋代四川(除家學以外)之私學教育，主要是由鄉先生所承擔，而非書院。宋代書院教育的重要性，被人爲地誇大了。而鄉先生的教育，長期以來卻爲人們所忽視。此外，像南宋寧宗時虞剛簡所建之滄江書院和楊子謨之雲山書院，從其形式與規模而言，與鄉先生的教學沒甚麼區別。這反映出早期私學書院教育與鄉先生教育之間的內在聯繫。

要全面深入地研究宋代鄉先生的教育情況，非一篇文章所能勝任，筆者選取宋代四川作爲本文之研究範圍，即意在盡可能地充分運用一地之史料，對鄉先生這一民間私學教育角色作較爲深入的探討，俾不致流於泛泛而論。由於各地發展的不平衡性，四川的情況與其他地區會有差異，但鄉先生教育的一些基本情況，應該是帶有普遍性的。筆者所接觸到的其他地區有關鄉先生教育的史料，亦支持了本文的觀點。私學書院教育在宋代的定型和制度化，在傳播學術思想(主要是理學思想)上的作用，以及對後世的影響等，自有其歷史地位。筆者在討論「鄉先生」這一民間私學教育角色的同時，無意走到另一個極端，刻意貶低書院教育的地位和作用。如果從時間(縱貫兩宋)、空間(遍佈城鄉各地)及教學層次(包括啓蒙到高深學問的探討)等方面而言，宋代鄉先生教育確實是書院教育所不能比擬的。爲宋代教育普及和學術文化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的鄉先生，不應該再被埋沒了。

## 後記

值拙文付印之前，陳學霖師告知，蕭啓慶教授在其剛發表的〈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〉一文中，<sup>98</sup> 引用了日本學者片山共夫研究元朝鄉先生的文章——〈元代の郷先生について〉。又承蒙蕭教授惠賜該文影印件，得以窺知片山先生的全文。<sup>99</sup> 片山先生的文章分爲「前言」、「隱居教授者與鄉先生」、「鄉先生的語義」、「鄉先生的教授活動與社會評價」、「結語」五個部分。片山先生在文章中引用了數條宋代史料，來討論「鄉先生」語義在宋代的變化。片山先生的論點是，宋代用「鄉先生」來稱呼落第舉人，以及本身沒有作官而爲科舉考生開設私塾的教師。在元代，宋末遺留下來的江南士大夫中，不求仕進，隱居鄉里，以教授爲業者居多，鄉人及門下弟子尊稱他們爲「鄉先生」。元代稱隱居教授者爲「鄉先生」，乃是繼承了宋代的用法。

片山先生的文章提供了元代鄉先生的一些情況，可與拙文相參照。

<sup>98</sup> 蕭啓慶：〈元朝科舉與江南士大夫之延續〉，載中國元史研究會（編）：《元史論叢》第七輯（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-19。

<sup>99</sup> 片山共夫：〈元朝の郷先生について〉，《モンゴル研究》第15號（1984年3月），頁15-28。

# *Xiang Xiansheng*: An Overlooked Role in Private Education in Song China, 960–1279

(A Summary)

Zou Chonghua

Scholars who study private educa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have mainly focused on private academies (*shuyuan*) while the role of *xiang xiansheng* (private teacher) in private education has been overlooked.

This article is an original study of *xiang xiansheng*. The present writer chooses the Sichuan area as a case in point.

The writer first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*xiang xiansheng* before the Qin dynasty and in the Song dynasty, and then examines in detail the role played by *xiang xiansheng* in education in the Song Sichuan area. The writer finds that many famous scholars were taught by *xiang xiansheng*, including persons whose families had a tradition of family education, and many famous scholars taught students as *xiang xiansheng*. A female *xiang xiansheng* has been identified.

The relation between *xiang xiansheng* and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s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. The writer compares the role of *xiang xiansheng* in private education with that of the private academies in Song Sichuan in order to prove further the importance of *xiang xiansheng*.

The conclusion is as follows: Private education (except family education) was not just provided by private academies but also by *xiang xiansheng* in Song Sichuan. The importance of private academies in the Song dynasty has been exaggerated. The role of *xiang xiansheng* surpassed that of private academies in terms of their overall historical duration,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d coverage of levels of education. We must not ignore the *xiang xiansheng* who had contributed a great deal to universal education and intellectual culture in the Song dynasty.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 
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 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